

香港的鄉村文化 大綱及文章(2015年11月17日)

(I) 影響本港新界的重大事件：康熙年間遷界、英人接管新界

康熙年間遷界

- 滿族入關建立大清皇朝，不甘臣服的漢人，紛紛南逃，而廣東和福建沿海居民，對鄭成功的「反清復明」義舉，多加以同情援助。
- 滿清政府為此，以「海氛未靖」為藉口，於康熙元年（公元 1662 年）頒布了《遷界令》，要江浙閩粵各省沿海居民向內陸遷徙五十里，以杜絕「海賊」。
- 所有被遷的村民，要離棄居所，燒屋廢田。全香港居民，被逼遷離，流離失所，生計全無，悲慘絕倫。
- 根據紀錄廣東早期歷史的王崇熙《新安縣志》（清嘉慶二十四年，公元 1819 年），香港遷界，居民被官兵逼遷，「野棲露處，有死喪者。」私自出界的，以亂賊入罪，捕後一律處死。
- 因體恤遷民疾苦，康熙七年廣東巡撫王來任向上疏奏，乞求展界。他與兩廣總督周有德奉旨來勘展邊界，十月周有德上疏，請先展界然後設防。清廷遂於康熙八年（公元 1669 年）正月陸續展界，「許民歸業……民踴躍而歸，如獲再生。」
- 至今，元朗錦田水頭村內，還保留了建於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的「周王二公書院」，以紀念兩位官員復界的功德。

英人接管新界

- 《展拓香港界址專條》（The Convention for the Extension of Hong Kong Territory）在 1898 年 6 月 9 日由清朝政府和英國在北京簽訂。
- 專條的主要內容是：
- 中國將 1860 年英國所奪占的尖沙嘴以外的九龍半島的其餘部分，即從深圳灣到大鵬灣的九龍半島的全部，租與英國 99 年；租期內租借地歸英國管轄。
- 租借地陸地面積 376 平方英里，其中大陸 286 平方英里，島嶼 90 平方英里，較原香港行政區陸地面積擴大了約 11 倍，租借地水域較前擴大四五十倍。
- 新界居民抗英事件之始末
 - 28/3 屏山達德公所(抗英揭貼)
 - 29/3 屏山鄧氏宗祠集會，反對英人接管新界
 - 3/4 大埔太和市文武二帝古廟

- 10/4 元朗舊墟內大王古廟附近之東平學社
- 17/4 林村之役
- 19/4 新界村民投降
- 22/4 村民返回各自鄉村，事始平
- 屏山觀廷書室：抗英失敗後，為接管新界之司令部
- 18/4 石頭圍(八鄉)、吉慶圍
- 一八九八年，英國強迫清廷簽定《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英政府於一八九九年四月接管新界時，錦田居民初不知道清政府與英國訂有租借條約而據守吉慶圍，抗拒接管。
- 最後，英軍攻入吉慶圍後，將吉慶圍的大鐵門搶走，運往英國蘇格蘭。
- 至一九二四年，鄧族後人才向港督史塔士（Sir Reginald Edward Stubb K.M.G.）請求發回鐵門修復。次年，鐵門終於平安地運返原處。

(III) 新界五大氏族 (鄧、侯、彭、廖、文、(陶))

鄧氏 松嶺鄧公祠

- 位於粉嶺龍山西北面山麓的松嶺鄧公祠是本港最重要及規模最宏大的祠堂之一。該祠堂約於一五二五年為紀念開基祖鄧松嶺公(一三〇二至一三八七年)而建，乃龍躍頭鄧族的宗祠。
- 建築物內外均飾有以吉祥圖案為題材的精緻木刻、彩塑、陶塑及壁畫，充分反映了昔日工匠的精湛技藝。
- 松嶺鄧公祠的全面維修工程得香港賽馬會及政府撥款，於一九九一年展開。工程在古物古蹟辦事處及建築署古蹟復修組監督下，於一九九二年中完成。祠堂於一九九七年被列為法定古蹟

廈村鄧氏宗祠

- 鄧氏宗祠又名友恭堂，是廈村鄧族為了紀念鄧洪贄和鄧洪惠兩位祖先開基勤勞之功而興建。據置於宗祠中進的「鼎建贄惠二公祠配享碑」所載，現時的鄧氏宗祠於乾隆己巳年（即一七四九年）立基上樑，並於乾隆庚午年（即一七五〇年）竣工，翌年正式奉主陞座。
- 宗祠曾分別於道光十七年（即一八三七年）和光緒九年（即一八八三年）進行過大規模修葺，祠內具歷史價值的建築構件和文物至今仍保存完好。**中進懸有多塊功名牌匾，展示鄧族祖先在清朝取得的顯赫功名。**
- 廈村鄧氏宗祠及其鄰近建築物於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七日列為法定古蹟。

新田大夫第(文氏)

- 這座華麗的府第於清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由文頌鑾所建。文氏的先祖自十五世紀已在新田定居。大夫第是本港最華麗的傳統建築之一，並以其精巧的建築裝飾而著名。
- 修葺工程由香港賽馬會資助，於一九八八年完成，現已開放供市民參觀。

麒麟文公祠(文氏)

- 文氏是新界「五大宗族」之一；雖然並非是最早遷居香港的宗族，但已於十五世紀，在元朗新田和大埔泰亨一帶定居。
- 麟峯文公祠坐落於新田低地上，建於二百多年前以紀念文氏先祖文麟峯。祠堂屬傳統的三進兩院式建築。
- 修復工程在一九八七年完成，費用由香港賽馬會資助。其後於一九九五年再次修葺，全部工程費用由政府撥款資助

上水居石侯公祠(侯氏)

- 河上鄉居石侯公祠始建於明朝末年，據侯氏族譜所載，該祠為侯族十七世祖侯居石所建。從懸於正門的牌匾年份推斷，居石侯公祠曾於清乾隆二十七年（公元一七六二年）進行修繕。
- 居石侯公祠正面的鼓台與門框均以紅砂岩建造，紅砂岩是傳統用於重要建築物的貴重材料。祠堂的屋脊飾有精緻的灰塑裝飾，建築物內外的駝峰、檐板及繫樑所雕刻的吉祥圖案及民間故事，也極為細緻華美。
- 居石侯公祠於二〇〇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列為法定古蹟，受《古物及古蹟條例》保護。

廖萬石堂(廖氏)

- 廖氏先祖原籍福建，於明代（一三六八至一六四四年）遷居上水雙魚河，子孫其後散居附近一帶。十八世紀時，廖氏勢力至為顯赫，這可見諸他們所建的祠堂--廖萬石堂。
- 廖萬石堂建於一七五一年，屬三進兩院建築。整座建築裝飾華麗，灰塑、木刻、壁畫、泥塑等比目皆是，題材多為傳統吉祥圖案。
- 廖萬石堂於一九八三年重修，費用主要由廖族支付。祠堂於一九九四年由政府斥資再次重修。

(II) 鄉村的特色

祭祖：鄧氏祭祖

- 鄧氏祖先墓穴是本港著名風水穴，位於荃灣，鄧氏後人每年於農曆九月。
 - 十九日到此舉行祭祖，人數過千，分別進行拜祭，過程十分隆重。
 - (1) 準備祭品
 - 祭品種類繁多，除乳豬數隻外，還有五生五熟：
 - 五生：蘋果、芒果、楊桃、橙及梨。
 - 五熟：粉腸、豬胰臟、豬肝、瘦肉及豬腰。
- 此外，五色餅、白飯及酒等。

盆菜

- 文天祥被元兵追殺，橫渡伶仃洋，逃亡至現時深圳一帶，由於天色已晚，而眾將士又非常飢餓。當地村民同情他是忠臣，用僅存的豬肉、蘿蔔，加上現捕的魚、蝦造飯，但卻沒有足夠碗碟，只好拿木面盆盛菜，將士圍盆而食。(第一個版本的起源)
- 南宋末年，當時宋帝昺與群臣南下逃難，途經現時的新界，村民見他饑寒交迫，於是每家每戶便把好吃的拿出來招呼這貴賓。但一時間卻找不著足夠數量的盛器，找來一個大木盆，把各種菜餚全放進去，成為盆菜。從此，圍村把這種吃盆菜的文化流傳至今。(第二個版本的起源)

學校的設置

如：敬羅家塾

- 位於大埔頭村，百多年來一直為大埔頭鄧氏宗族的家祠，曾作書室之用，現仍是族人聚會和舉行傳統節日活動的地方。
- 該建築物的確實建造年分已無從稽考，據說是明朝時由第十三代鄧氏族人玄雲、梅溪及念峰公所建，以紀念他們的第十代先人敬羅公。
- 敬羅家塾於一九九八年八月被列為法定古蹟。

如：鏡蓉書屋

- 是少數專為教學用途而建的書室，位於沙頭角上禾坑的客家村內，是由該區李姓客家人於清初建成。初期僅是一所供二、三十人就讀的私塾，至乾隆年間（一七三六至一七九五年）始再行重建，改名為鏡蓉書屋。
- 由於專供教學之用，所以建築頗為簡單但實用，建築物只有兩個廳堂和閣樓，分別用作課室和宿舍。書屋外形呈長方形，牆身用青磚砌築，屋內用

未經燒製的泥磚和夯土作間隔。

- 書屋於一九九一年被列為法定古蹟後由政府進行全面修復工程，現已開放供市民參觀。

	農村私塾
上課時間	全日制，朝七晚五（約九小時）
時間表	沒有
學費	以米糧作學費
級別編制	沒有編制
課室	一個
設備	簡陋
每班人數	沒有規定，約二十至三十人
學生年齡	六至十八歲
學生性別	只有男生
上課內容	儒家思想，提倡孝道，尊敬祖先，單一
教師人數	一人
書本	《三字經》，《千字文》，《四書》和《五經》
課外活動	沒有
體罰	教師可用厚木尺責打學生
假期	傳統節日、捕漁旺季各收成季節時

文章(一) 從新界鄧氏建築看其家族對科舉功名的渴求

已有三次前往粉嶺龍躍頭的經驗，每次到達松嶺鄧公祠前，都會想起「皇姑」故事：宗祠門前有對聯云：「偉業貫雲台，漢室將軍綿世胄；芳聲留稅院，宋朝郡馬大名家」，其中後聯吸引了人們的注意，怎麼香港這一彈丸之地，竟出現「稅院郡馬」？原來南宋末年，宋室一趙姓女子南逃，被鄧元亮仗義相救，並把她許配與其子鄧惟汲，該女子竟是高宗之女、孝宗之姊、光宗之姑，是所謂「皇姑」。現祠堂內供奉一世祖元亮公、二世郡馬鄧惟汲與皇姑趙氏神主，皇姑神主有龍首於頂，甚為特別。從以上的故事，可見鄧氏宗族對名聲、功勳的重視。要延續此種殊榮，似乎透過科舉考試考取功名，是最為有保障之門徑，本文嘗試從鄉村建築探討本地鄧氏宗族對功名的重視。

其實，科舉之路是辛酸的，所謂「五十少進士」，不少學子把畢生精力放在科舉考試上。明清時期，學子在私塾學習，先讀《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隨後閱讀《千家詩》、《幼學瓊林》、《龍文鞭影》等詩歌課本和知識讀物，作應試之用。考生要應付童試、鄉試、會試及殿試，通過殿試者稱「進士」，由皇帝御批第一甲頭三名，依次稱為「狀元」、「榜眼」、「探花」。

在二帝書院書室前院，有以白石鋪砌，稱為「白石巷」，用以提醒入讀子弟讀書與仕途之艱辛。在學習及考試期間，考生須經歷不少頗為悲慘的遭遇，如塾師可對學生進行體罰，處罰方式有三種：立、跪、責，其中「責」是指利用誠方等責打學生，輕罰者打手掌，重罰者則用誠方打在頭部或臀部上。在新界地區士子參加鄉試，須前往廣州貢院應考，貢院是清代舉行鄉試、會試的考場，貢院的兩旁建有號舍，供考生考試及居住。當考生進入所屬號舍後，隨即關上號柵，等交卷時才重開。每個號舍的面積只有3尺x6尺，無論答卷、食宿、睡覺也在號內進行，離不開那幾塊木版，可謂苦不堪言。明英宗天順七年（1463年）的會試，有考生更斷送了寶貴的性命。話說當時天氣很冷，巡邏士兵生火取暖，引起火災，考生的號舍頓時變成一片火海，由於貢院已上鎖，考生無法逃生，最後竟有九十人葬身火海中，受傷者不計其數。

要體現鄧氏宗族對功名的重視，首先，從其宗族所建書院或書室數目之多，

便可以一斑，因書院是培育莘莘學子考取科舉功名的場所。從附錄一〈清代修建新界學舍一覽表〉¹ 可見清代時，港九新界共有 45 間學舍，而其中位於錦田、廈村、屏山、粉嶺及大埔的書室，多數為鄧氏所建，以下介紹幾所為人認識及與鄧氏有關的書室或書院：

第一所是力瀛書室，是香港九龍新界等地最先設立之書院與學舍，是鄧符協所立。² 第二所是敬羅家塾，位於大埔頭村，百多年來一直為大埔頭鄧氏宗族的家祠，曾作書室之用，以傳統「卜卜齋」形式授學，就讀子弟一度達四十多人。第三所是觀廷書室，位於屏山坑尾村內，建於道光年間（1870），兼具教育及祭祀祖先的雙重作用。第四所是周王二公書院，話說清初自順治年間下令遷界，將範圍內大部分村莊房舍焚燬。遷界本是為了避免沿海居民與鄭成功接觸，以及防止海盜的侵犯，但施行時卻為區內居民帶來家破人亡的痛苦。到了康熙八年（1669）下令復界，復界之功有賴廣東巡撫王來任，與協助展界之兩廣總督周有德，故鄧氏族建周王二公書院，以作紀念及培育人材。第五所是二帝書院，它是錦田十六位聲名顯赫的士紳籌組的鄧二帝會在水頭村興建的。內裏重構昔日「卜卜齋」的場景並有供奉財帛帝君、文昌帝君、關聖帝君、魁星踢斗像。「文昌」，本是星宮名，簡稱文星，或稱文曲星，古代星相家將其解釋為主大貴的吉星，隋唐科舉制度產生以後，文昌星尤為文人學子頂禮膜拜，有謂文昌「職司文武爵祿科舉之本」。而魁星，則為讀書士子的守護神。顧炎武《日知錄》說魁星實為「奎星」，因為奎是「文章之府」。奎星為二十八宿之一，被古人附會為主管文運之神。因「魁」與「奎」同音，并有「首」意，所以代替了「奎」字。它後來被描繪為一赤發藍面惡鬼，立于鰲頭上。一腳向后蹺起如大彎鉤，一手捧斗，另一手執筆，表示在用筆點定中試者的名字，這就是「魁星點斗，獨占鰲頭」。這個徵兆被讀書人視為神明，並以為是高中之兆。在此順帶一提的，位於屏山的聚星樓最上層亦供奉着魁星（圖十三），而它又與青山風水遙相配合，亦可護佑族中子弟在科舉

¹ 見《教不倦 - 新界傳統教育的蛻變》

（香港：香港區域市政局，1996），頁 86-87。

² 見羅香林：《一八四二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對外交通 — 香港前代史》

（香港：中國學社，1959），頁 193。

中考取功名。

除了靠讀書考取功名外，鄧氏族人也熱衷於武舉考試，其中長春園是唯一主要用作訓練武科人才的學堂，現存有關刀三把及練武石，以作昔日練武之用。

此外，我們可從各種建築物的對聯、牌匾、雕刻裝飾，來體現宗族對功名的追求。首先說說祠堂，祠堂建築文化形式上，集中地體現了中國古代人們社會生活的特點，³ 朱熹的家禮有云：「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于正寢之東」，說明一個家庭在建造房屋時必須要建祠堂。

至今已有七百多年歷史的屏山鄧氏宗祠，是三進兩院式的宏偉建築，為香港同類古建築的表表者。宗祠對聯是「南陽承世澤，東漢啟勳名」，對聯說明南陽(今湖北省襄樊市鄧城至河南省鄧縣一帶)鄧氏世代相傳，歷史悠久，人才輩出，為國立功，澤陰後人。下聯是歌頌鄧禹(第四十七世)扶助漢室，統一中國，開創了偉大的歷史功勳，光對聯以十個字概括了鄧氏數千年的光榮歷史。

宗祠頂部處有石灣鰲魚一對，它擁有龍頭魚身，口部微張，各含一明珠，唇呈波浪形，尾部上翹，面向中央，側臥在屋脊上。前文提及魁星立於鰲頭上，所以鰲魚往往被視作功名的吉祥物，另松嶺鄧公祠、廖萬石堂，皆有精美的鰲魚雕飾。

宗祠前面放有四對功名石石碑，上刻「道光丁酉科(即道光十七年 1837)，中式舉人鄧勳猷立」，族中為考得功名的子弟豎立一塊功名石，在石上詳細記載中舉者的姓名、中舉的時間以示表揚，讓經過村內及村外的人都知道，能夠光耀門楣。

宗祠正門前兩旁是鼓台，各鼓台有兩柱支撐瓦頂，內柱為麻石，外柱則為紅沙岩，鼓台是供達官貴人橋車停泊、轎夫休憩之處，可想像當時各地方人士；當然包括擁有功名者到達祠堂時的熱鬧場景。

進入宗祠第一進後，會看見高高懸掛著一個牌匾：上刻有「欽點翰林院庶吉士」、「同治十年辛未科」、「臣鄧蓉鏡恭承」。「庶吉士」是指清代翰林院設庶常館，欽點一些於文學書法方面表現突出的新進士入館學習，庶吉士也叫做庶常，

³ 金其禎主編：《中國祠堂》(重慶：重慶出版社，2003)，頁1。

學成後主事各部，或作編修，或選為知縣。昔日成為庶吉士者，族人都覺得光榮，而且這牌匾有「欽點」大字，顯示皇帝的權威，所以被懸掛在廳中最崇高的位置。

「欽點翰林院庶吉士」這一牌匾，令我想起鄧氏宗族其他的祠堂或建築物，也滿掛功名匾額，其中以泮流園前院正樑懸掛的「父子登科」匾額最為醒目，匾額為兩廣總督阮元及廣東巡撫怡良為鄉民鄧鳴鸞及其子鄧廷柱所立，二人分別在道光元年（1821年）及道光二十年（1840年）中武舉人。

清代新界區內考獲最高的科弟名次是甲科進士，考獲者是鄧文蔚，在錦田永隆圍大門左壁懸掛了鄧文蔚「進士」功名匾額，上刻「康熙乙丑科會試中式第六十八名鄧文蔚立」。另又有鄧英元武魁功名匾額，「上刻乾隆五十四年（1789）鄉試中式為武舉第三十八名」。

位於廈村友恭堂鄧氏宗祠有懸掛「歲魁」功名匾，上刻：「欽命廣東提學使司提學使沈曾桐」，「宣統二年庚戌（1910）一名歲貢生鄧翹嶽立」。而較特別的是橫樑上懸掛五個功名匾，自左至右次序排列為：「旨賞換花翎」、「欽賜銳勇巴圖魯」、「翰林院庶吉士」、「欽點禮部主政」及「欽點花翎侍衛」，前四者屬同治時期，而最後者屬光緒年間。在祠堂內花炮旁邊，也放了很多功名匾，標誌著族中子弟在科舉場上的成就，上刻有「舉人」、「副魁」、「亞魁」、「稅院郡馬」等等。

從鄧氏宗祠的三進式建築，可見該族的成員曾任四至七品官，因祠堂的興建不單要有錢還要有功名，且按功名來分等級。官一至三品者，可建五進，在香港沒有，廣州陳家祠即是一例。官四至七品可建三進；八至九品可建兩進。若無功名者只可在家中建一神閣供奉祖先。

除了宗祠外，書室的雕刻裝飾也能體現鄧氏家族追求功名的理想。獅子為書室的裝飾浮雕，是頗為普遍的題材，有一大一小、一大二小、二大一小或二大二小，獅與「師」諧音，因此給人很多聯想的空間，如古官制中有太師、少師，都是輔弼天子的高官，地位顯赫。⁴ 故大獅小獅代表官運亨通、飛黃騰達之意；而雙獅並行象徵事事如意，獅配綬帶表示好事不斷，獅子滾繡球寓意好事在後頭，雌雄獅子伴幼獅祝子嗣昌盛，四獅代表四世同堂，又獅子坐樹下或山石上象徵登

⁴ 馬素梅著：《屋脊上的願望》（香港：三聯書店，2002），頁68。

科進士。⁵ 觀廷書室屋脊之處有一大獅及二小獅的雕飾，而進入敬羅家塾後，在壁間有狀似獅子或麒麟動物的浮雕，甚為精美。

鯉魚亦是最常見表現功名的題材，傳說很久以前黃河泛濫，大禹以疏浚辦法排泄洪水，這種為民除患的精神感動了玉帝，玉帝命女兒下凡化作塗山女嫁給大禹，助他治水。大禹用鬼斧把攔住的一座大山劈開，給洪峰鑿開一條通道，可是居住在黃河的鯉魚卻被沖出禹門，無法溯流而上返回故鄉。為了鼓勵鯉魚躍過缺口，於是塗山女奏准玉帝，能躍上缺口者馬上化為飛龍，騰雲上天。因此禹門又稱龍門，有「一登龍門，聲價十倍」的說法，後來人們用登龍門來比喻在科舉時代參加考試獲得進士功名。在敬羅家塾壁間，便懸有鯉躍龍門的精美浮雕。

值得一提的，是本地書室常有「博古」的雕刻，博古是指由大小不同的長方形組合而成的一種圖案，觀廷書室的博古採取了鏤空的長方形組合，外貌儼如一條連綿不斷的環帶，造形優美。在線條之間更加插各式各樣的吉祥物塑像，如桃、佛手果、獅等。敬羅家塾、二帝書院、周王二公書院皆有博古，造形較觀廷的為簡樸。

現在談談鄧氏宗族重視功名的背後意義，首先當然是可以光耀門楣，前文提及祠堂之內懸掛各種匾額，紀錄了考獲功名族人的姓名及榮銜，足以光宗耀祖。⁶ 鄧氏族人在考取功名方面，可謂十分爭氣，翻開《新安縣誌》看看，便可知道於清代時，鄧氏宗族共有五十七人在科舉考試上取得成就，⁷ 有考獲歲貢生、例貢生及武舉等。

若某族產生了進士、舉人或監生、貢生等讀書有成的人，不單能光宗耀祖，更可令家人享有政治、法律、經濟和賦稅上的種種特權，令該族在地方上的勢力和地位便得以提高。前文提及鄧文蔚是清代時期，新界區內考獲最高的科弟名次的甲科進士。他是錦田泰康圍人，於順治十四年（1657）考中舉人，及後經過二

⁵ 同註 5

⁶ 北區區議會出版：《北區風物志》，1994，頁 14。

⁷ 見王崇熙等纂：《新安縣誌》（二）清嘉慶二十五年刊本
（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頁 393-458。

十多年的苦讀，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中式進士，晚年授浙江龍游縣知縣，到任後不久逝世。但憑藉他的政治身份積極團結和發展鄧族的勢力，鄧文蔚的始祖本源於東莞，他致力於團結整個東莞鄧氏宗族，在東莞縣城建造鄧氏大宗祠「都慶堂」，藉此團結分散的同族，還可為族人赴考時提供住宿之所。此外，康熙八年（1669）遷海令解除，鄧文蔚以其政治地位，將原來於大橋墩的元朗墟市，遷移至西邊圍、南邊圍之間，即今日元朗舊墟位置，至光緒年間，此墟已發展為深圳以南最大的墟市，⁸ 從以上的例子，可見擁有功名者對宗族有著深遠的意義。

談及成為鄧氏宗族成員的楷模人物，一般人都會提到鄧洪儀及鄧師孟，錦田開族祖鄧洪儀，有弟洪贄，娶東莞何真之姪女為妻，因明初藍玉一案，洪贄亦被株連獲罪，遣戍遼東。洪儀認為弟弟賦性愚頓，中途定有不測，於是冒認弟弟戍遼東。而大埔鄧師孟以身贖父皆為族人稱頌，松嶺鄧公祠右殿則供奉鄉賢，正中為鄧師孟的神位。鄧師孟原為僕人，十六世紀末，與主人同被賊人所擄，師孟冒稱為主人的兒子，願留賊船為囚，賊人釋放其主人回家籌集贖金；主人離去後，師孟即投海自盡，死後被追認為忠僕，入祀鄉賢。

其實，科舉高中者，往往也能成為鄧氏後人的學習對象，除了前文提及的鄧文蔚外，另一位高中進士的是鄧蓉鏡，他是粉嶺龍躍頭生員，在 1871 年高中進士，成為該處二百年來第一位取得進士的學者。他不但受鄧氏族人推崇，即使位於沙頭角屬李氏宗族的鏡蓉書院，其名稱也可能取自鄧蓉鏡，希望子弟如他那般能高中。另外鄧與璋、前文提及的鄧英元鄧鳴鸞父子，也是受族人稱道的。鄧與璋是乾隆丙辰（1740）鄉試中式第二名，後在會試中，取中明通榜，為人「仁厚坦直，學問淹博，居鄉處朋儕，必誠必信」⁹。至於鄧英元及鄧鳴鸞，前者生平「正直誠樸，而最工書法，鄉邑建築，其題額多為英元所書」，而後者則「自少膂力過人見稱」。¹⁰

在思考這份學期功課期間，令我想到以下兩個問題，在此提出些愚見。凡能

⁸ 《教不倦 - 新界傳統教育的蛻變》（香港：香港區域市政局，1996），頁 75。

⁹ 見羅香林：《一八四二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對外交通 — 香港前代史》（香港：中國學社，1959），頁 212。

¹⁰ 同註 9

通過所有考試者皆可獲授官職，晉身仕途，成為士紳階層的一份子。¹¹「士」的中心任務是文化和思想的傳承與創新，¹²而曾參又表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¹³根據以上的標準，那麼鄧氏的科舉高中者，能配上「士」這個名銜嗎？其實他們往往把士人與政治的關係，簡化為一單純的利祿之門，把讀書的事情，簡化為一單純的利祿工具。¹⁴這一現象是相當可悲的，士從本質上作了那麼重大的改變。

此外，明清科舉以考八股文為主，此制度真能為朝廷選取真材嗎？八股文專取四書五經命題，考生須代聖人立言，不可抒發個人的見解。在形式上是一種重排偶的文體，每篇文章由開端的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而轉入正文的起股、中股、後股及束股，由八部分組成，故謂之八股。八股文強調的是背誦能力，而所背誦內容都以儒家經典為主，故此學子在十五、六歲時，必須純熟地背誦出合共有四十三萬一千二百八十六字的四書和五經。

這一種考核制度至少有以下兩個不良後果：學生透過對儒家先賢著述的學習，只能間接地認識中國古代人文科學的發展，至於純科學知識的傳授，中國向來不予重視。加上清代時期，滿人對漢人更是推行「抑其道器而揚其文詞」的文教政策，使中國近代科技教育落後及未能工業化的原因。此外，即使在八股文上有出色表現而高中者，是否能確保他們就一定懂得為官之道及處理行政上的要務呢？如果未能當上好官，又怎能光耀門楣呢？

本文限於篇幅，只能集中討論鄧氏種種，但其實除了鄧氏外，新界其他大族如廖氏及侯氏，從其建築裝飾也可體現其重視功名的想法，如廖萬石堂為上水廖族最大的祠堂，內有「兄弟科貢」牌匾，又懸有「文魁」功名匾；而位於河

¹¹ 《百年樹人 - 香港教育發展》(香港：香港市政局，1993)，頁 16。

¹² 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引言頁 1。

¹³ 同上註

¹⁴ 徐復觀等著、周陽山編：《知識份子與中國》(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0)，頁 211。

上鄉的居石侯公祠，門前懸有「文魁」功名匾，而門前更有「加官」、「晉爵」四字，表現其對功名的渴求，但礙於篇幅所限，不能一一細說。

參考書目

- 王崇熙等纂：《新安縣誌》(二) 清嘉慶二十五年刊本
(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
- 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 金其禎主編：《中國祠堂》(重慶：重慶出版社，2003)
- 馬素梅著：《屋脊上的願望》(香港：三聯書店，2002)
- 徐復觀等著、周陽山編：《知識份子與中國》(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0)
- 陳志華、黃家樑：《簡明香港歷史》(香港：明報出版社，1998)
- 樓慶西：《中國古建築二十講》(北京：三聯書店，2001)
- 劉兆瓚：《清代科舉》(台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77)
- 羅香林：《一八四二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對外交通 — 香港前代史》
(香港：中國學社，1959)
- 蕭國健：《香港歷史點滴》(香港：現代教育研究社，1992)
- 蕭國健：《新界五大家族》(香港：現代教育研究社，1990)
- 蕭國健：《香港的歷史與文物》(香港：明報出版社，1997)
- 《百年樹人 - 香港教育發展》(香港：香港市政局，1993)
- 《北區風物志》(香港：北區區議會，1994)
- 《教不倦 - 新界傳統教育的蛻變》(香港：香港區域市政局，1996)
-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古物古蹟辦事處編製小冊子：
二帝書院 2001 年編印、錦田古蹟遊覽圖、屏山文物徑 1999 年編印、廖萬石堂
鏡蓉書院 2001 年編印、龍躍頭文物徑 1999 年編印、敬羅家塾 2003 年編印

文章(二) 大埔泰坑(泰亨)齋醮

大埔泰坑(泰亨)是由三個村落組成的單一宗族的社區，住在這裏的人，據說都是十五世紀初定居此地的文高的子孫。¹⁵ 泰亨所舉行的是五年一屆的三朝醮(圖一)，大部分鄉村的醮期，都是五年或十年一屆，最長的周期據說是上水，每六十年舉行一次；最短是在長洲，每年舉行一次。舉行的時間還有農業社區和漁業社區之分。一般來說，農業社區如新界泰亨和粉嶺圍，舉行的時間在農曆十、十一月；漁業社區如長洲，則多在農曆四、五月。¹⁶ 所謂「醮」，則是一個通過道士、和尚為媒介與鬼神溝通的大規模祭祀活動。「醮」的種類繁多，台灣最常見的醮有平安醮、瘟醮、慶成醮、火醮等四類。在香港，除沙頭角吉澳、西貢高流灣及塔門等社區稱為「安龍清醮」外，大部分的醮都稱為「太平清醮」。太平清醮是一種保平安的「平安醮」。¹⁷

建醮的目的，當然是酬謝神恩、祈求風調雨順、事事順景，在泰亨文氏自行刊印的太平清醮特刊中，已表達了此一願望：「論到『打醮』，為一種許願還神風俗，目的祈求年年風調雨順，老少平安，民康物阜，生活安定，並為邁步展向繁榮，點綴社會昇平，務求人神共樂，心安理得」；¹⁸ 「為酬謝神恩庇佑，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¹⁹ 「泰亨建醮，既是為泰亨鄉求福，也是為香港；為祖國求福，利己又利人，願大家的生活更美好，社會繼續繁榮安定，國富民強，誠祈所願焉」。²⁰ 另外，建醮也可令族人更為團結，已旅居海外的親故，常藉醮期回來探望鄉親，大家共敘天倫，正所謂：「然欣逢佳期，旅外宗親，攜眷絡繹言旋，同祝盛會」；²¹ 「在神恩及祖先庇蔭下，冀望我族人團結一致，堅韌踏實，

¹⁵ 參考蔡志祥：《打醮：香港的節日和地域社會》(香港：三聯書店，2000)，頁 75-77。

¹⁶ 參考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網頁：<http://www.cciv.cityu.edu.hk>；擷取於 28/11/05。

¹⁷ 同上註

¹⁸ 《泰亨鄉太平清醮特刊》(乙丑年)文暮良一文，頁 20。

¹⁹ 《泰亨鄉庚辰年太平清醮特刊》文暮良〈發刊辭〉。

²⁰ 《泰亨鄉庚辰年太平清醮特刊》文春輝〈盛典致詞〉，頁 10。

²¹ 《泰亨鄉太平清醮特刊》(乙丑年)〈建醮敢言〉，頁 22。

靈活應變，和衷共濟，求同存異，有容乃大」；²²「每屆醮期，鄉內喜氣洋溢，普天同慶，旅外宗親，絡繹歸旋，同祝盛會，聚首一堂，談天說地，檢討過去，共創未來，意義重大」。²³ 在我們品嚐齋菜的同時，看見周遭都是一家大小圍坐，他們互相拍照、舉杯暢飲；熱鬧非常。

說回齋醮的問題，打醮期間需要肉體和精神上的潔淨，所以要禁止殺生，進行“齋戒”。²⁴ 誠然，素食確實在有不少好處，正如星雲法師認為其有助美容、保健、有益身體健康，而最重要的是能「長養慈悲心，從心靈的淨化來減少瞋怒，達到內心的安然、祥和」。²⁵ 泰亨文氏於打醮期間，喜以齋菜招呼本村及外來人士，謙稱：「素菜淡茶，失禮貴賓，招待不週，多多涵諒」。²⁶ 烹調齋菜的廚房面積不算大，內有四至五個工作人員負責烹調食物，而廚房前有人負責清洗蔬菜及碗碟。廚房使用的爐灶已有六十多年歷史，以柴薪作為燃料，這樣才夠火力(圖二)，至於齋菜則用三個大黑鍋來煮。材料方面，較特別的是芥菜及蕪菜不用；醬料方面，主要是用南乳及腐乳。所有齋菜放在一個錫盆中，一圍桌子一盆齋菜。齋菜要求要色香味俱全，我們看到錫盆內有綠綠的蔬菜；橙橙的酸齋；黃黃的菠蘿、枝竹、齋鮑魚；白白的蘿蔔、粉絲；黑黑的髮菜、冬菇(圖三)。

在建醮時期，人們都會遵照吃齋的習俗，即使神功戲的表演者也要吃齋菜。在祭大幽儀式完畢，送走鬼王之後，正醮正式結束後，才能夠開齋食葷。村內外人對齋宴的反應很踴躍，每天開設 100 - 120 圍，尤其在下午五時至七時這段免費供應齋菜的時段，一家大小也紛紛入圍吃齋；至於七時後即須預訂，前來吃齋的人數也相當理想。

至於到工作人員“打齋”的程序，原來每一款齋菜已預先烹調好，並分別放在一個個大大的銀錫桶中(圖四至六)，然後每當人們入席後，外面的人叫起齋，

²² 《泰亨鄉庚辰年太平清醮特刊》〈千禧龍年建醮敢言〉，頁 26。

²³ 《泰亨鄉庚辰年太平清醮特刊》〈太平清醮之溯源〉，頁 28。

²⁴ 同註 2

²⁵ 香港素食學會愛心出版社：《茹素》〈星雲大師談吃素心得〉106 期，2004 年 11 月。

²⁶ 《泰亨鄉庚辰年太平清醮特刊》文藝南〈致謝詞〉，頁 37。

裏面的一位工作人員一隻手拿起錫盆，然後另一隻手拿起一個大銀勺，有序地舀起每一款齋菜放入錫盆中(圖七)。打齋的程序是先放白蘿蔔，然後是枝竹、齋鮑魚、粉絲、酸齋、髮菜、冬菇、蔬菜，最後加上腰果，擺放時像農曆新年的全盒一樣；一格是酸齋，一格是粉絲，一格是竹枝，如此類推……

我們往往可以從打醮一系列的複雜的儀式中考察鄉民的象徵世界，更可藉着打醮時鄉民的社會活動，觀察族群及社區的重層關係。²⁷ 而齋醮可或使我們了解一個族群的飲食風尚及習慣，某程度上表現身份的認同。



²⁷ 蔡志祥：《打醮：香港的節日和地域社會》(香港：三聯書店，2000)，頁 11。

